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 鲁国尧

《古文观止》，是我自上中学至今六十多年来的良师。此书收录了自《左传》至明末的两百多篇文章，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文，三百多年来没有一个文化人没有读过它。我认为，此书对民族精神、素质的塑造，功不可没。

据我粗浅的感知，阅读或吟诵《古文观止》，如注重文采，则多取唐宋文；若注重义理，则应取先秦文。这两句话，前者易于理解，后者需要略加解释。

请读《郑伯克段于鄆》篇，其中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古往今来多少恶人的作为都应了这句话。《石碏谏庄公》，“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于今何尝不然，尤其是对“官二代”“富二代”？《祁奚请免叔向》叙述退休的老臣祁奚请求晋君赦免了贤人叔向，结尾是“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二人之德于斯可见。这些篇章蕴含人生哲理，我很爱读，尤其在我进入老年之后。以上几篇选自《左传》。源于《战国策》的《唐雎说信陵君》。文短而精悍，我多次读过，再读一遍，心灵即接受一次“再教育”。兹将原文逐录于下：

信陵君赵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

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我最服膺的是这一句：“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不可忘”就是铭记的意思。用一个词儿来表达全句的思想，我以为非“感恩”莫属。在战国时代，在西汉季年刘向校勘整理《战国策》的时代，汉语里尚未有“感恩”一词，我查了《汉语大词典》，陈寿著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里方出现此词。我又想了解现代词典收“感恩”一词的情况，我多年前在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国音词典》，里面收录了“感恩”一词，而民国时期的《辞源》（正续编），未收词语“感恩”。

近年来“感恩”一词很是流行，耳濡目染，我在写作时也用了起来。2013年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是我五年来撰写的论文汇集，40万字。写《自序》，到了结尾时，我怀着满腔的感情写下了这么一句：“本集诸文的思想渊源和学术渊源，端赖中外先贤的教导、启迪，在此谨表示我的‘感恩’心情。”

如今我要再次写下“感恩”一词。

我生而有幸，欣逢商务印书馆双甲子馆庆，兹向商务印书馆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表达我的“感恩”心情。

名称有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研究中国现代的图书出版机构名称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说，第一代是“印书馆”，此后是“书局”，再后为“书社”，当今通用的是“出版社”。《孟子·离娄上》里有“天下之大老”一语，可以借用来形容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它是中国出版业的“天下之大老”，它是我最早、最负盛名的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由屈辱到崛起，由贫弱到富强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商务印书馆对国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莫大焉。

“大至于天下，小至于个人”，作为一介学人，在这里简要叙述我“感恩”于商务印书馆的一些情况。

如果从中学懂得读书开始，估计六十多年来我读了商务印书馆的几千本书，现在我拥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和杂志逾千册。这些书，如果分类的话，主要有两类，一个大类是语言学的书籍和刊物，另一个小类是哲学书，当然还有其他如史学、外文等类的书，不赘。

1957年，我在本科三年级分专业的时候，选了语言学作为终生

学习、工作、研究的事业，于今整整六十岁了，六十年为一甲子，恰好是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后半。读了商务印书馆这么多的书，“受惠多”的词典，我有《现代汉语词典》的试印本、试用本、第一至第七版，在我读书、教课、写作的时候，它们是我时时求教的良师益友。要说明的是，我的第五版、第六版都是商务印书馆赠送的，我在拜读之后还为这两版各写了一篇书评，臆陈得益之多，也不揣谫陋，提了些许建议，当然，这不足以回报于万一。受赠的那装帧精美，红色与金色交相辉映的《辞源》（第三版），既解答了我的不少疑难，也为我的陋室带来了喜庆的气氛。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类的书籍和刊物，数量最多，质也最高，于我，一言以蔽之曰“获益良深”，难以一一缕述。这儿仅举一本薄薄的书——《方言调查字表》为例，我做方言调查时自然离不开这个罗盘。我在几个高校开音韵学课约三十次，每次第一堂课开课单，要求学生必须购置这本书，其一便是《方言调查字表》，我给了它一个别名《现代韵镜》，以与音韵学的经典宋代《韵镜》配套。仅此一书，我为商务印书馆推销了几百本（去年我应邀在师大授课，八十多个学生，人手一册），不过要紧急声明的是，讲这

个细节并无索取提成的意思。

不可不为前面讲的“另一个小类是哲学书”这句话做点说明，因为会有朋友问，你是语言学工作者，怎么收藏哲学书？我作答如下：我自将身许与语言学的六十年来，做过许多文献研究，也做过若干田野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步入老年前夕，我惶惑、我焦虑：花甲之后如何度过“余生”？如果不想优游度日，仍旧继续做学问，该怎么办？当然可以继续做数量的积累，但是此非“上策”。人，应该有精神、有志向，应该致力于质的提升。那么，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在西方的某种语言学说的后面，做跟从式的研究；一是走“坚实、会通、创新”之路，为中国语言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而奋斗。我不自量力，步武前修，师法大画家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所以我近十几年，读了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甚至古人类学、社会学的若干论著，目的就是力图克服朱德熙先生所指出的当今学者“陋”的弊病，会通多学，以臻胜境。在摸索中，我的体会是，诸君中哲学更为重要，我读了冯友兰、张世英、何兆武、朱光潜诸前辈的大著。为什么要读哲学书？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指出，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的能力，我十分服膺此说。这篇短文写到这里，该点睛了：读哲学书，绝对不能

不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部大丛书有五百本，是百年来几百位精通外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打造的精品书库。以前我购过、读过语言学类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语言论》、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四本，但是对其他类的书则“置之不顾”。这十几年我“变法”“转型”，因而对这套大丛书里黄皮书即哲学类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购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黑格尔的一些书。罗素的《西方的智慧》（实为《西方哲学史》简明本）我读过两遍，它对我撰写《哲学札记》一文（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很有帮助，因此2016年我见到商务印书馆的可供书目里有罗素的《哲学大纲》《哲学问题》《罗素自选文集》三书，我立即即购回来。我认为，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坚持“不崇洋不排外”的方针，既要了解、研究中国的学问，也要了解、研究外国的学问。我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书，旨在拓宽自己的视野、充实自己的头脑，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语言学书以及一些哲学书，学问稍稍有了点长进，我“感恩”，我牢记住两千年前中华民族先贤的教导：“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商务是作者的温暖之家

■ 戴庆厦

的温暖之家。

在与商务具体合作的过程中，商务编辑工作的两性——严肃性与温暖性深深感染了我。严肃性是指他们对出版物一丝不苟，严肃对待。每个编辑对我出的书要求都很严，稿中凡见到错误的、含糊的、不明白的、遗漏的、不规范的，都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才付印。这种严肃的编辑作风保证了质量。商务编辑除了严肃性的一面外还有温暖性的一面。他们尊重作者，虚心倾听作者的想法，多与

作者商量，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作者。我们与编辑打交道，感到不拘束，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一想，这两个特点大概是商务历史传统的积淀，也是一代代领导坚持下来的传家宝。

商务人有很强的事业心，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出版有价值的书。举例来说，本世纪初，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需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现状及演变，为此，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决定做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国情调查项目，并

出版系列调查丛书。我与商务领导周洪波总编辑谈了这个想法，周总立即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已在商务出版了21本语言国情调查个案专著。这些成果为语言工作者、国家决策部门了解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变化提供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和新的认识。又如，我在大学教了几十年的语言调查课，有一部积累调查经验和教学经验的语言调查手稿，商务的领导和编辑知道这

一情况后决定为我出版这部教材。在责任编辑刘建梅的精心编辑下，这部教材很快就出版了，并且成为高校语言调查课的一部选用教材，在短的时间里已再版了。

商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职责仅放在出书上，而是把出版与推进国家的文化、科学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为了促进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的结合，商务和社科院语言所等单位连续几年共同召开“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讨论大家所

关心的语言认同、跨境语言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学科建设，还有利于中青年学者的培养。

我还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商务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著作，以其品牌优势推动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对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举措，深得少数民族的敬仰和热爱。

热烈祝贺商务印书馆建立120周年，衷心祝愿商务印书馆今后越办越强！

我和商务印书馆的十五年

■ 郭 熙

越来越有序。

多年来，我目睹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汉语世界》《家国情怀》《世界语言生活状况》《世界语言生活报告》等等的设计、开题、审稿等，我都有幸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已经成了“商务人”。周洪波先生曾经笑谈要我到商务工作算了。我说，现在已经够累了，再到你这儿，不要把命交了啊。周总是个工作狂，多年来，没有看到消停的时候，要么工作，要么抱个电话。他不知疲倦，是个“神人”。没有他好像就无法运转，而有了他，我们就得一直跑，一直转，无法停下来。

我最怕接到周总的电话。到北京华文学院任职前的几年里，我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飞北京，可谓“召之即来”。我后来曾给周洪波开玩笑说，我到北京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商务印书馆，为馆里节约了大笔机票和旅馆费用。

《家国情怀》曾记录了和冯雪峰“被关”的故事。其实我被扣留是家常便饭，我每次到商务都有被扣留的危险。发展到后来，只要是周洪波通知的会，我都会多带几件衣服，以防“不测”。

作者兼“员工”的我和商务

还有些情况下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作者还是员工了。这里说两件事。

一是《全球华语词典》。2002年12月下旬，我接到商务印书馆通知，到北京参加《华语词典》（当时的名称）筹划会议。这事源于两个因素。2002年6月，在南昌一个学术会议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时任商务印书馆汉语室主任的周洪波建议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同年11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语信司司长的李宇明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周先生又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杯洒允词典”的故事（郭熙，2015：120）。我从2000年起开始

关注海外华语，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商务邀我参加《华语词典》应源于此。这次会议讨论了《华语词典》编写的意义和基本设想，但当时对于海外华语有研究的人还不多。随后的几年里，围绕华语词典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2005年1月，正式定名《全球华语词典》后的第一次编委会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召开。同年，暨南大学成立了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全球华语词典》是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说，本世纪初的南洋之行使我进入华语研究的蓝海的话，《全球华语词典》毫无疑问是一支强大的助推剂。《全球华语词典》到后来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写，使我们对全球华语有了更多的认识。《全球华语词典》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胆识和开放态度。词典的英文名称一开始有些纠结，我建议直接用HUAYU，商务印书馆就大胆采纳了。就我所知，这是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把“Huayu”引入英文。

编词典的这些年里，还遇到了一群好朋友，志江老师的睿智，刘一玲的犀利，都使我受益良多。我永远都会记住这一群“小伙伴儿”！

二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4年1月，李宇明、王铁琨、周庆生、周洪波和我在教育部参加绿皮书编写会议，午后周洪波的五杯咖啡又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写的动议和随后的落实，自此开始了每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生活。

作者的我和商务

最早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是于根元老师带领下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2003年出版）。只是那时都是于老师直接跟商务印书馆联系，我对馆里的编校运作等情况因此没有太多的认识。

2004年，承蒙赵金铭和齐沪扬二位先生邀请，我承担了商务印书馆系列对外汉语教材中《华文教学概论》的编写，其间分别在上海师大和商务印书馆开过两次论证会。该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华语研究录》《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等。作为作者，我一次次领教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水平的高超，工作态度之严谨，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

我在写作中一直追求语言的平实和可读性，有时候甚至还对自己的东西有些沾沾自喜。但在《华文教学概论》的编校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功夫还差得很远。袁舫女士一次次电话、电邮联系，核对每一个细节，确认每一个疑团。其中，为了华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区别，我们讨论了很久。有一段话我认为自己说得很清楚了，责编袁舫却来电话问是什么意思。这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任编辑尚无理解的话语，学生或普通读者如何明白？这促使我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后来发现，我当时的概括的确没有抓住本质：我们只是从教学对象的不同去讨论区别，而没有从教学目标上去思考。我也由此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明白，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没有想明白，或者想得很不明白。

201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语研究录》是我本世纪前十年在海外华语、华文教学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思考，文章都是国内或国外报刊公开发表过的，也都经过一轮轮的编校。这次编辑出版，责编蔡长虹女士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提

出的疑问密密麻麻。初版于1999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3版，前两版经过多轮校读，我自己也一遍又一遍地校对，但到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刘建梅女士手上，又发现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此外，戴军明先生在编辑《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2015年出版）、《全球华语研究文献索引》（即将出版）中，其政治的敏感、业务的熟练、专业的敬业，都使我和我的团队感到由衷的佩服。作为作者，我曾经想过的是荣耀，而多年下来，我更感到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多么幸运。这里的编校过程是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是保护自己学术声誉的一个屏障。这些都因为商务印书馆有一支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我永远会记住各位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年来，作为作者，我先后参与主编或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中国语言生活要况》《华文教学研究丛书》《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全球华语研究文献索引》等，还担任《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副主编等。

“员工”的我和商务

说自己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主要是因为担任《语言战略研究》杂志执行主编，此外我还是词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当然，后两个是虚的。

2014年开始，《语言战略研究》开始构想。从刊物理念，到刊物名称，到运作方式，田立新司长、李宇明先生、周洪波先生多次就杂志进行讨论，我也参与其中，收获颇丰。在当今中国申办一个新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务印书馆凭借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近些年在语言服务国家方面的积累，赢得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批准。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和同事到有关部门就申办一个杂志的事去汇报，对方讲了申请新杂志

